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第四十期 2000年12月
Taiwan: A Radical Quarterly in Social Studies
No. 40, December 2000.

殖民的現代性營造——
重寫日本殖民時期
台灣建築與城市的歷史*

夏鑄九

Building Colonial Modernity: Rewriting Histories of
Architecture and Urbanism in the Colonial Taiwan

by
Chu-joe Hsia

關鍵詞：建築史，都市史，殖民城市與建築，現代性，殖民的現代性

Keywords: architectural history, urban history, colonial cities and architecture, modernity, colonial moderni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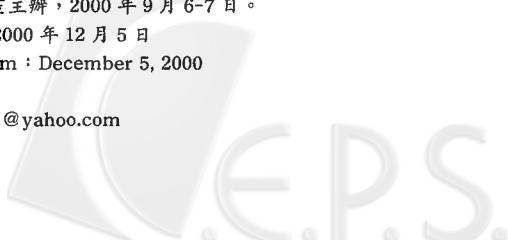
* 修改前論文曾以基調演講發表於“被殖民都市與建築國際學術研討會”，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東南亞區域研究計畫主辦，2000年9月6-7日。

收稿日期：2000年10月24日；通過日期：2000年12月5日

Received: October 24, 2000; in revised form: December 5, 2000

通訊地址：國立台灣大學 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email: Hchujoe@ccms.ntu.edu.tw, hchujoe@yahoo.com



摘要

本文討論日本殖民時期台灣建築與城市歷史寫作之方法論，而由於歷史角度之對話，認為日本殖民時期台灣建築與城市是殖民的現代性營造：一種沒有主體建構過程的現代性。作者強調，首先，由世界史之中的第三世界歷史的角度，尤其是由十八世紀末到十九世紀的殖民建築與城市之歷史系譜，審視日本殖民時期的台灣建築與城市。其次，由比較研究，一方面可將近年英、法等殖民地建築與城市之研究，與日本殖民台灣之建築與城市相互比較，不但可以認識到殖民建築與城市之共同性，而且可以認識日本殖民的特殊性。另一方面，日本殖民地間之比較研究，更可以使我們進一步理解中國東北、韓國與台灣間之特殊性及其日後的不同命運。然後，在殖民地之共同經驗上，本文討論日本殖民時期台灣建築與城市所表徵之殖民現代性建構，這是主體缺席之現代性。以此為基礎，我們才得以建構批判的現代性，在質疑歐洲/日本中心性與獨特性預設下，重寫他者（異己）之歷史。最後，作者指出歷史工作者必須以有反省性之反身認同，重建自身之歷史感。這是主體建構之必要過程。這是歷史創造與實踐中摸索所必須的歷史感，也是展望明日之台灣城市與建築之視野。所以，殖民現代性營造的歷史，其實是為不斷的歷史對話所重寫的歷史。

Abstract

This paper provides some initial considerations of Japanese architecture and urbanism in colonial Taiwan. I argue that architecture and urbanism during Japanese occupation are a project of building colonial modernity; that is, modernity without subjectivity. First, I review colonial Taiwan's architecture and urban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hird world history vis-à-vis that of the world history, with emphasis on the genealogy of the colonial architecture and urbanism in the late 18th and the 19th centuries. Second, through a comparative study with some recent research on British and French colonies, I will show not only the commonality of colonial architecture and urbanism among them but also the specificity of Japanese colony. Following that, a comparative study among different Japanese colonies, I will demonstrate further the specificities and the different destinies of those various places in the post-colonial period. My goals are to synthesize those common colonial experiences and to argue that the colonial modernity represented by the Japanese colonial architecture and urbanism in Taiwan is a modernity from which the subject is absent. Based on that argument, I will formulate a critical modernity and suggest that the others' histories be rewritten through questioning the centrality and uniqueness of Europe/Japan. Finally, I propose that a reflexive project of self-identity is a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a historical sense of subjectivity reconstitution. That historical sense is crucial for making history and practice as well as for a vision of the cities and architecture of tomorrow. The histories of building colonial modernity, therefore, have to be rewritten in the form of on-going historical dialogue.

由於三點原因：一，所有的歷史都不免是當代史；二，前總統李登輝在其日文新著《亞細亞的智略》中聲稱現在的台灣新政府已不是“中華民國在台灣”，而是“台灣中華民國”，是“新共和”，也是“第二共和”；三，台灣確有必要在近 20 至 30 年的建築與城市史的研究後能進行認識論反省，以求有能力既與世界學術界對話，又能接合台灣之現實；準此，本文討論日本殖民時期台灣建築與城市歷史寫作之方法論。殖民建築與城市之歷史研究必須處理幾個歷史寫作的問題，即，與殖民者間之平等關係、殖民地的歷史形構、被殖民社會之社會結構與動力，最後，它們如何以空間的知覺與形式來表現與抵抗“殖民”。這些固然有賴於理論接合 (theoretical articulation) 之能力，可是，這個表現過程的特殊性與棘手處在於歷史寫作的**反省性對話之意義** (the meaning of reflective dialogue)。被帝國主義殖民的社會，是一個被殖民國家資本主義化的社會結構，以及，這個社會具有被殖民歷史所分化的菁英與一般平民，也因此，被殖民與後殖民歷史所錯置的認同經驗所束縛。這需要以訓練有素的眼光去釋明 (decipher) 一層層被塗掉後重新寫上的地景，以具有深切反省能力的反身性認同 (reflexive identity) 重建被殖民者自身之歷史感。作者強調歷史角度之不斷對話，本文之主旨在於：日本殖民時期台灣建築與城市之歷史意義是一種“殖民的現代性” (colonial modernity) 之營造。即，作者重新建構殖民的現代性概念，一種沒有主體建構過程的現代性，來深化對殖民建築與城市之分析。

就建築史與都市史之論述形構 (formation of discourse) 言，一方面，都市史之浮現與領域爭奪是較晚進建構之學問，受到 1970 年代社會科學反省後衝擊較大，也不可能，也不必要，再建構一個學域邊界清楚的都市史，但也使得研究之視野更形開闊，研究成果所跨越之光譜更為複雜 (夏鑄九, 1997; Kostof, 1986; Fraser and Sutcliffe, 1983)。另一方面，直到 1970 年代末，建築史由於其論述建構的歷史的與制度的原因，在教學與研究過程中，方法論的工具鮮受討論，以

致於，自身之意識形態假設少經質疑，研究也大多是學院內封閉圈子內之再生產，迫使我們必須再反省建築史特殊的歷史思考方式(modes of historical thinking)：像深受常規性藝術史知識傳統所影響的建築史，他們對歷史的哲學觀點、對歷史分類的範疇（像建築史是建築師之歷史、建築史是建築師作品之歷史、建築史是建築物之歷史……等等）、對編年的或風格的斷代範疇、如何概念化形式、風格、圖象、與空間，以處理真實空間中的建築形式與空間經驗、對技術演變的歷史與形式的看法、對形式與社會生活間關係的看法等等（Porphyrios, 1981; Tafuri, 1980; Watkin, 1980）。今天看來，這已經是對任何建築與都市史之獨立研究都不可或缺的方法論自覺，因此，我們對日本殖民時期台灣建築與城市歷史寫作也必須重新發問，接合現實，對歷史意義提出更深刻之對話。

一、由世界史的角度看待第三世界之殖民建築與城市

首先，我們需要由世界史的角度看待第三世界之殖民建築與城市。即使再簡略，它至少得包括：由十五世紀末葉歐洲開始的大發現與殖民，啟動了社會與文化巨變，其結果必須與工業資本主義社會對傳統與以農業文明為基礎的社會穩定所造成之斷裂一起考察；再追溯資本主義之重商主義自十七世紀由歐洲東來亞洲，思考十八世紀法國大革命與啓蒙主義哲學的理性要求，保守主義思想之對抗，以及，十八世紀歐洲民（國）族國家(nation state)之建構與防衛；最後是十九世紀的帝國主義世界性擴張，鞏固世界市場與競相佔有殖民地，達到歷史高峰。其中，尤其重要的是考察十八世紀末到十九世紀的亞非拉殖民建築與城市之歷史系譜，審視日本殖民時期的台灣建築與城市。由第三世界的角度反視，第三世界國家各國的情境各有其特殊性，而共同經驗就是資本主義擴張下的殖民歷史，長時間為外國力量所支配。因此，殖民地的相對體就是帝國主義。

就世界史之角度言，1500年時，全世界有16%的土地為歐洲國家

所控制。1810年時，有25%的土地為外國所佔。到了1878年時，比例上升為67%。到了1910年，達80%。至於1914年一次大戰前，整個世界已經有84-85%的土地是以英、德、法、美、日等國為宗主國。十九世紀，整個印度、印尼、中國（半殖民地）、亞洲（日本除外）、拉丁美洲、非洲、只有東歐除外（而波蘭、希臘又除外），為帝國主義實際上的政治權力所控制，包括了中國的通商口岸（treaty ports）。甚至，到了1960年代，仍有一半的世界為殖民地。也正因為如此，發展（development）與矮化（或，低度發展，underdevelopment）是在同一個世界裡進行的事務。第三世界國家是在殖民的歷史情境下工業化、現代化、與都市化的，即使二次戰後政治上相繼獨立了，殖民的歷史結構卻在政治獨立之後依然存留下來。甚至是各種地理邊界，以至於國界，也是殖民者按其勢力範圍所劃定的。像西非就是一個顯例，大部分國家如賴比瑞亞、象牙海岸、塞內加爾、馬利等都是殖民的產物。現在，他們都像是民（國）族（nations）的實體一般成為國家了，但是，歷史上並沒有什麼歷史的塞內加爾，它是殖民者的建構。歐洲國家在1883年聚會柏林時，在柏林條約上決定誰能在非洲得到什麼，於是，按照歐洲國家的需要，瓜分了非洲，完成了殖民地間的領域分配，也產生了法屬象牙海岸與英屬加納等國。

而對日本之殖民言，日本明治維新之“脫亞入歐”計劃與大和民（國）族之民（國）族認同計劃、大正時期之民主計劃、昭和時期之軍國主義計劃，都必須以天皇為中心的神道國家，經由其民（國）族文化之認同計劃，肯定日本的獨特性與神聖性，面對西方挑戰而現代化，然卻未“西化”的社會政治過程，一起分析。這個以天皇為中心的神道國家，不同於宗教改革後之西方國家，明治天皇以後的日本國家，一直到1945年戰敗為止，國家的主權同時涉及精神權威與政治權力。神道國家最純粹的空間象徵就是國家神社。國家將所有的真善美的內在價值都包含在民（國）族政體的自身之內。民（國）族主義（nationalist）的力量使得日本得以“上升”，國力與西方主要的帝國主

義平起平坐。國家的公共領域（空間）完全支配了私人領域，使得市民社會的、自主的公共/私人領域（空間）無由獲致正當性，只有和民（國）族事物結合才能獲致真正的認同。¹若再與上述歐美帝國主義崛起之歷史一同審視，可以這麼說，他們彼此競爭對亞洲之殖民入侵（competitive colonial invading），“東洋”²與“西洋”左右了中國，以至於台灣的命運。我們在這樣的光亮下重看台灣的城市與建築：

在近代世界市場的力量吸引下，西班牙曾短暫地將澎湖媽宮視為東亞貿易的轉口港（1626-42），由荷蘭東印度公司的殖民者物色之**重商主義港市**則是台灣早期的**殖民城市**，最有名的例子應是熱蘭遮城（安平）與普洛文蒂亞城（赤崁，台南）。早期的殖民城市是取得原料的收集中心（像鹿皮與蔗糖），也必需是軍事與政治的控制據點。台灣，一如海南島，一直是中原皇權所忽略的“海外荒陬”與流放的“亡命之地”。就都市意義的層次言，在**漁港、海寇基地、朝廷軍營城砦與政治亡命者/反抗者的軍事基地、漢族農業移墾聚落**之間所形成的緊張政治關係之上，再加上殖民者之軍事介入，不但使衝突更激烈，台灣的城市也被迫在澳門、香港之後，納入了世界史。由於殖民者之軍事與政治干預原因，要求古老帝國的皇權及其消極的官僚不得不正視在東南海疆叩門的陌生人，以及，台灣這片新土地的秩序。媽宮、笨港、鹽水、淡水、雞籠等城市刻畫了一直到清代建省之前，台灣本身片斷不連續而異質的地方空間（space of places）特色。

本文焦點既然是殖民城市，作者不擬就明清之台灣城市多著墨。但是，爲了後述之殖民城市範疇之反省，我們在方法論層次必須先處

1. 參考丸山正雄的分析（Masao Maruyama, 1963:6-7），轉引自：Castells（2000:226）。
2. “東洋”是日本爲了對比以西歐爲中心之“文明開化”國家，表現自己對文明化的自信而創造的“措辭”，指的是地理上以日本爲中心，位於同一區域，但文明上却較爲落後的區域。根據韓國學者白永瑞的說法，日本把亞洲做爲一個單位，經由“脫亞”與“興亞”，到日俄戰爭後總結爲“亞細亞主義”，最後表現爲“大東亞共榮圈”的構想（白永瑞，1999:4）。

理“前殖民城市”(pre-colonial cities) 這個極有爭議性的範疇,提出一個都市考古學角度下的提綱。³我們至少需指出所謂“前殖民城市”之時間與性格上的爭議性。它們在時間上固然與荷蘭和西班牙的殖民不易區隔,可是真正的困難毋寧是所謂前殖民預設範疇上之爭議。所謂前殖民城市之主要性格正在於漢人對今天台灣所稱的原住民進行商品經濟的剝削、軍政的壓迫、與漢文化的支配。這就是說,其實仍是文化研究論述中某種範疇界定較鬆散的內部殖民。⁴然而無論如何,清代中期,活潑的社會流動終於使得後來研究台灣都市史的學者們得以

3. 台灣在日本殖民之前並非是“未開化的蠻荒之地”。首先,清代台灣農業生產及商品經濟所推動的,台灣各地域分別與唐山對渡的河港與海港城市(章英華,1986:238;林滿紅,1979:18-32;林玉茹,1993),因此,商業貿易是城市的基本功能,行郊為基本的社會組織,碼頭利益的爭奪是現實的衝突,然而,卻以地緣與祖籍為主體辨認的分類械鬥的動力。這些港口城市如:東港、打狗、安平、北港、東石、布袋、朴子、鹽水、鹿港、梧棲、後龍、新莊、艋舺、大稻埕、雞籠、頭城等(侯怡泓,1989:34)。其次,清代由南至北,分縣立廳,治理台灣市街的軍事、政治與教化功能(施添福,1989:32),說明了當時台灣各地域的政治中心角色。因此,保持空間結構的政治層級與權力中心性的策略正在於區域城市與港口城市之配對模式建立,也因此,區域行政中心多數建有城牆,它們是屢次政治騷亂所攻佔的目標。接著,視托地域行政中心城市周圍星羅棋佈的則是為數最多的,台灣做為農業移墾社會的漢人農業移墾聚落。土地的所有權者與耕佃勞動者間的結構性矛盾,以及土地與水源之爭奪則是聚落衝突的爆發點。那麼,必需注意到存在而一直看不到的就是:急遽發展的漢人農業聚落對農耕土地的熱切需求與原住民部落之間的衝突,它不但是平埔族部落消失的主因,更表現在“隘勇線”與“土牛溝”的隔離與分割作用上,這確實是漢人與原住民族群衝突關係在時間與空間上的表現(施添福,1990:61),而且還是漢民族文化之“飲食”論述將原住民由“生”至“熟”,將“自然”對比“文化”,漢化(經常是客家化)與文化教化力量的表現(Chiu,1994:141-142)。像暖暖、新店、大溪、北埔、竹東、關西、東勢、埔里、竹山、白河、關廟、旗山等都是這些漢人開墾聚落的例子(侯怡泓,1989:34)。所以,在台灣城市的活力與在異質與不連續的空間特徵之背後,清代台灣城市構構的主要政治過程在於港口城市與地域政治中心間的政治權力層級關係的建構,這也就是說,相對於商品經濟所推動的市街成長、“土著化”過程(陳其南,1975)與地域信仰圈的形成(許嘉明,1973;侯怡泓,1989:27)的諸現實經濟、社會與文化,這是清代台灣城市之政治治理、軍事控制與文化教化的中心化作用。參考:夏鑄九(1995)“台灣的都市變遷:一個都市考古學的提綱”,“文明史上之台灣”國際研討會,台灣大學日本綜合研究中心主辦,台北,台灣大學法學院,1995年10月15日。
4. 作者在此文中的“殖民”界定其實是傾向較嚴格定義的“殖民”,即後文中所述,“對另一國家領土之佔領,以及以軍事與政治之直接壓迫為機制建立的不對稱關係”。

在論述上建構出在全島的層次的三條南北縱列成線的漢人城市之都市模式，甚至，逐漸形成了一種共生關係之組合，這就是：**港口城市、地域性政治中心與山麓地帶做為農業開墾據點之山產集散地**（侯怡泓，1989:30-31；Wheeler and Pannell, 1973:21）。這個建構過程一點也不是平和的，只是鄉愁式論述視而不見其間的衝突罷了。在此同時，台灣的經濟即使逐步開始納入了國際分工，區域空間領域上有“一府、二鹿、三艋舺”的提法，清代的台灣仍不易形成全島性的大城市。

“漢人殖民原住民”的“前殖民城市”中，各區域中心的分散模式仍然是主要的。在南北一系列，為商品經濟所支持的，與唐山對渡的河港城市的身後，這些地域與其政治中心，仍以福建省城為依歸，如恆春、鳳山、左營、台南、嘉義、彰化、苗栗、新竹、台北、宜蘭等（章英華，1986: 239; 142；侯怡泓，1989:34）。這種都市模式其實是典型漢民族在發達的商品經濟中之“城”與“市”分離模式之台灣版本。

“衙門”與“集市”本是不同的空間分工，我們可以在明清江南市鎮中見到它的發達表現，前者之政治與教化份量逐漸為後者，也就是所謂資本主義萌芽中之發達商品經濟所淹沒。甚至，更可以在日後上海英租界中，見到了與“衙門”全然不同功能的“現代行政中心”出現。⁵只是這種現代行政中心是在殖民地之歷史脈絡中產生的，這種由衙門到行政管理之角色轉化與“向先進國家的學習（移植/複製）過程”，也就關係著後文所指之殖民現代性建構。

到了清末，台灣開港貿易的影響終於造成了台灣經濟重心北移，北部的茶及樟腦為主的貿易額超過了南部以糖為主的貿易額，淡水取代了打狗，成為台灣最主要的貨品輸出港，也推動了台北建城與置省會的力量（夏鑄九，1988:278-279）。雞籠到新竹的鐵路建設一方面固然表現了以劉銘傳為代表的“自強新政”對新技術的開放與接納，它更表現出以鐵路帶動區域經濟發展之空間組織萌芽。最後，1887年（光

5. 這是柏克萊加州大學葉文心教授的看法。

緒十三年) 台灣建省,則是政治上開始將台灣做為一個**整體單位**對待。歷史的弔詭莫過於,台南一直是全台政治的中心,然而,當整體單位的政治辨認開始建構時,卻是台南失去做為政治權力中心的局面,台北,反而成為省城之所在。而在這種整體單位建構時,漢人進一步對山地資源之墾殖破壞也使得原有“隘勇線”與“土牛溝”之劃分瓦解。

也就是這樣的時空下,隨之而來的殖民依賴關係所塑造的的都市化過程裡**移植**(transplanted)了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城市**。台灣也經由這個日本殖民的**移植過程**,真正形成了全島的**整體性格**。

分享布野修司的理論角度,與世界體系下殖民城市形構的理論角度對話(Shuji Funo, 2000),**殖民城市**是**殖民依賴關係**(殖民的依賴性, colonial dependency)的具體化。這裡的“殖民”概念狹義地指涉:對另一國家領土之佔領,以及以軍事與政治之直接壓迫為機制建立的不對稱關係。至於依賴關係,其實是一種經濟上的剝削(exploitation)、政治上的壓迫(repression)、與文化經驗上的支配(或譯為宰制, domination)關係的不同層次抽象,著重的是兩社會間關係的不對稱性。在軍事與政治鎮壓所決定的殖民依賴關係的基礎上,由1898年兒玉源太郎總督與後藤新平民政長官開始,台灣被強迫納入殖民母國經濟之中,殖民城市的空間進一步地為資本主義的生產、分配、消費所結構。在資本主義發展的現代化過程中,資本投資所需的基礎建設開始著手,人民的精神狀態也必需經由新的理性來改造,然而,這些卻是**殖民現代性**的建構。在清代漢人支配的既有歷史之上,**台灣是為日本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方式所結構的社會**。在台灣,它不但實現了日本資本主義的原始積累,而且體現了與殖民母國間的**商業依賴關係**(commercial dependency)與**工業依賴關係**(industrial dependency)。這些在下節有理論對話的意義。前者經由日本與台灣間的貿易的不等價交換機制(the mechanism of unequal exchange)——由台灣提供農產品交換日本的工業產品——塑造了台灣的地景。而後

者則在日本殖民後期，太平洋戰爭爆發，台灣的工業化是做為南侵而發動的。台灣是日本“進出南洋與中國”的前線基地。台灣本身工業的自主性是不存在的，殖民母國工業化了台灣，但是它的資本也控制了台灣的市場。於是，商業依賴與工業依賴在殖民依賴的大傘之下，結構了台灣的社會與空間。在區域空間結構上，由於殖民依賴的經濟榨取，創造了日本與台灣海岸線港口城市之間的強大聯繫，甚至超過了台灣本身區域內部之聯繫。基隆，以輸入為主；高雄，以輸出為主；南北兩端港市的急速發展，它們的任務又為運輸路線、南北縱貫鐵路與公路所強化。然後，沿縱貫鐵、公路兩側所發展起來的農業加工與農林業集散城市，如羅東、豐原、員林、虎尾、新營等。至於原有的區域行政中心城市，也相對得以穩定發展，台中、台南、高雄、新竹、嘉義之間的差級也較接近（夏鑄九，1988:284；章英華，1986:252-253）。相較於其他開發中國家，如拉丁美洲的殖民經驗，這也可以說是殖民依賴都市化在台灣的空间結構之特殊模式。至於移植過程中的手段，都市計劃（urbanism 或是 city planning）與建築（architecture），我們留到後文做為說明的例子。其實，殖民建築與城市之研究並不意味著“自然”是殖民者眼光之外的世界，相反地，殖民地景（colonial landscape）是更恰當的字眼。這個為殖民者所翻攪，一層層被塗掉重寫的台灣地景，是殖民者想像的自然，殖民者“大日本帝國”想像的地理學（imagined geography）之中的“其他的自然”（他者的自然）（other nature）。中島弘二清楚指出殖民者的民（國）族主義意識形態所再現的自然，日本殖民主義地緣政治結構中的中心是日本內地，次外圈是北海道、琉球，再往外是朝鮮與台灣，再外一圈是滿州與中國，最外圈則是東南亞與太平洋諸島，共同形成一個大東亞共榮圈的層層同心圓。嘲諷的是殖民者的造林政策下，與日本內地的愛護森林形成差別對待，朝鮮的森林有如無須“愛林”的“不毛林地”（wasted forest land），台灣的森林則是“往熱帶森林之踏腳石”（Nakashima, 2000,16-18）。當然，這些被視為是“資源”的砍伐森

林對象卻不是無人之地，這裡是台灣原住民的生活地方，與殖民者間之劇烈衝突可以想見。⁶

二、由比較研究中“看見”自己的建築與城市

其次，由比較研究，一方面可將近年英、法等殖民地建築與城市之研究，與日本殖民台灣之建築與城市相互比較，不但可以認識到殖民建築與城市之共同性，而且可以認識日本殖民的特殊性。譬如說，戈溫德林·萊特 (Gwendolyn Wright) 受到米謝·傅科 (Michel Foucault) 之啓發，認為二十世紀初期的法國殖民地，已經不只是實驗室，也不只是與今日有關的鏡子而已，它是透露野心與恐懼的放大鏡，透露出政策與技術竟然在家裡可以知所節制，而在殖民地卻一無限制，因此，殖民地不能孤立於其他西方的都會區來研究 (Wright, 1991:306,312)。安東尼·金 (Anthony King) 在其過去政治經濟學研究之基礎上 (King, 1990) 進一步接受了後殖民研究之啓發，由全球化角度了解文化與認同的再現，提醒連結今日之全球化與殖民建築與城市之間有反省性的新角度 (King, 1996, 1997)，以及，尼沙·阿薩雅 (Nezar AlSayyad) 與勞倫斯·維爾 (Lawrence Vale) 分別之編著中認為殖民主義是種現代主義的論述 (colonialism as modernist discourse)，討論十九世紀末與二十世紀初的殖民經驗經不可避免地要處理現代性課題。阿薩雅引用安東尼·紀登斯 (Anthony Giddens) 對現代性的理解，指涉了約在歐洲十七世紀浮現的社會生活與組織方式 (those modes of social life or organization)，後來影響了全世界。現代性為兩種不同的組織複合體：民 (國) 族國家與有系統的資本主義生產 (Giddens, 1990:1; AlSayyad, 1992:9)。以此切入，殖民

6. 甚至，由於民 (國) 族意識，這種想像的地理學的陰影是日本人自己習而不察的。它一直延續到今日，日本經濟對東南亞森林的破壞行爲，使得其生態觀被質疑為森林中的鬼影 (shadows in the forest)，一種假想的生態 (shadow ecology) (Nakashima, 2000:23)。

建築與城市的研究，可對殖民主義、資本主義與民（國）族認同 (national identity) 提出分析性的反省 (AlSayyad, 1992 ; Lawrence, 1992)，後文將做進一步闡述。若加上阿薩雅所負責之傳統環境研究國際學會 (IASTE,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Traditional Environments) 及其機關刊物《傳統住居與聚落評論》 (TDSR, Traditional Dwelling and Settlements Review)，相較於過去歐洲中心的建築史研究，亞非拉殖民地建築與城市之研究可說已在後殖民論述下起步，擠身既定之建築與城市的歷史研究領域。這些近年殖民建築與城市所開創的的研究方向，值得我們在面對日本殖民時期台灣建築與城市之研究時，與其進行理論對話。

這些第三世界國家，或者說發展中國家的空間結構，其邏輯深深地關係著不同國家與社會之間不對稱關係的歷史過程。譬如說，歷史地，這些國家大部分的人口都集中於沿海地區，特別是圍繞著大的港口城市。為何如此？因為大部分的關係都是屬於殖民母國都會區與殖民地之間之依賴社會的貿易關係。同時，這關係還要被其他的不同類型的依賴關係，如商業依賴、工業依賴、金融依賴、技術依賴、文化依賴、地緣政治依賴……等加以修正。假如特殊類型的依賴性，強調政治因素重於貿易模式，就會有不同的空間結構之表現。例如，不像葡萄牙對巴西之殖民，西班牙在拉丁美洲的殖民比較上是軍事與政治的殖民，因此，大城市如墨西哥，就不是一個港口城市。墨西哥與其他殖民地的空間模式相反，可說是在先前的首都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西班牙人連空間支配的結構都一併佔領了。而巴西，早期巴西卻全然沿著海岸發展出對葡萄牙的貿易關係。在非洲，英國的殖民地是貿易與商業的功能，所以強調港市，而法國殖民則是政治控制與軍事征服。同樣的情形發生在亞洲，英國，由於賦予殖民地貿易港市（通商口岸）之意義，如香港，因此，關乎當地社會與制度，被殖民者之買辦角色就有其重要性。也因此，殖民者需要以較和平之手段籠絡被殖民社會之上層菁英，無須對該社會內部功能運作做太多的干預。因

為，直接的政治干預反而需破壞既有社會的機構與制度，要創造新的機構與制度，將所有的殖民人口納入一新的情境中。前述的西班牙基本上是個君主社會，它要的是黃金與財富。西班牙殖民不是以貿易來組織宗主國與殖民地的關係，不是為了資本的積累而服務，或為投資而服務，它的主要的元素是如何控制正在作用的人的資源。所以，西班牙殖民以改變信仰為手段，假如不能控制，就以神的名義屠殺他們。而葡萄牙則相對較弱，無力控制，所以與地方經濟發生貿易關係。像十九世紀英國在非洲一般，給予港市（通商口岸）地方自主性，在地方菁英間作用，所以能進行貿易，而整個社會基本上在菁英統治下運作。這些不同類型的殖民，並非是說在道德上何者為佳，只是說，它創造了不同類型的社會，不同類型的機構與制度，不同類型的空間結構。簡言之，不同過程產生了不同的形式，並不容易一般化為一種殖民的空間結構。那麼，日本呢？台灣是日本之農業基地，土地與農業勞動力是生產之關鍵元素，因此，一種殖民資本主義與地主經濟的接合，共同形成了台灣特有的殖民地社會的“二重構造”，⁷而漢人農村中之地主與佃農的生產關係一直未見改動，警察之暴力則是日常生活之控制，至於原住民部分，則是更為血腥之鎮壓了。

另一方面，在矢內原忠雄研究之基礎上，近年如越澤明等之研究，日本殖民地間之比較研究，可以使我們進一步理解中國東北、韓國與台灣間之特殊性及其日後的不同命運。經由比較研究，我們其實更清楚地對照中看見了自己的什麼都不是的身形。譬如說，漢城市中心景福宮前總督府與台北市中心景福門內總督府，兩個殖民總督府，它們都是日本殖民時期之權力中心。可是，它們與週圍建成區之關係，以及其建築表現，有些什麼共同性與差異性呢？更有意思的是，戰後它們受到截然不同的什麼對待呢？這些不同並不是意識形態地推論為神秘化的民族性，而值得做理論之比較與分析，它們的歷史的與政治

7. 涂照彥之概念，轉引自陳志梧（涂照彥，1975:205；陳志梧，1988:249）。

的原因何在呢？我們又如何反省這種不同的民（國）族認同與民（國）族主義的發展呢？

我曾經與我的一位因意外事件早逝的優秀韓國博士生崔誠烈一起反省與比較過殖民建築所再現的民（國）族認同。與五島寧（Goto Yasushi）對漢城（京城）市區改正（1913-1937）的研究（五島寧，2000）對話，本文可以用一些我們過去共同撰寫的文字，做為在都市象徵層次進一步比較的例子：

在漢城，高聳而盤據在低矮的景福宮正中合院裡的朝鮮總督府是十足的惡霸。這是赤裸裸的暴力凌駕在景福宮屋頂與韓國人民的頭上。台灣總督府的惡行也不遑多讓。在台北，日治殖民城市是徹底地“刮去重寫”（palimpsest），改變空間是為抹除記憶。台北城由一個坐北朝南的古老帝國邊陲的行政中心，被硬生生地扭轉為朝向日出之東。除了道路的取向切線被重新調整之外，媽祖廟被民政長官紀念館置換，巡府衙門則被肢解為兩部分，分別移置他處……坐鎮在片瓦不存的城市中心是威嚴而肅殺的台灣總督府，它的前後則佈滿了殖民者的軍事機關，其左右則是金融與司法機構。朝鮮總督府的建築師為喬治·拉蘭地（Gorg de Lalande），他在1912年負責設計工作，1914年去逝，由曾參與台灣總督府設計的野村一郎後繼其志。然而，這兩個如此相似的殖民總督府在殖民時的表現形式還是有所差異，以及，在殖民之後也有著全然不同的命運。做為權力表現的朝鮮總督府與台灣總督府的空間表現形式有所不同，朝鮮總督府垂直高大的西洋古典權威相對於景福宮的東方式水平伸展宮庭合院，朝鮮總督府直接的對比式鎮壓，持續不斷地刺激韓國民（國）族主義者的身體感官。1995年，在國際冷戰圍堵政治下建構的，軍事獨裁集團右翼政權的反共民（國）族主義瓦解之後的敏感時刻，拆除朝鮮總督府成為金泳三文政府政治改革策略與回復民（國）族正統性的象徵。將圓頂用吊車吊起時其實就是斬首，沸騰的情緒糾合了大韓沙文主義自卑與自尊之情結，其封閉的父權權威決策過程，成功地壓抑了左翼的共存與承認北

韓的政策，以及，學運中的南北韓統一運動。然而在台灣，殖民時期完全拆除巡府衙門固然也是殖民者鎮壓的痛苦寫照，但是，當新建的總督府最後因全然取代，而竟然逐步變成社會記憶的一部份時，歷史的扭曲就更令人棘手了。台灣總督府所透露的“刮去重寫”方式是用新的權力形式取代舊有。當刺目的鎮壓已經習慣為對權力的順從，馴服成為被殖民者本身記憶的一部分時，為了在民（國）族國家重建之民（國）族認同計劃中塑造“異己”，歷史經驗被極度扭曲，殖民者之現代化建設被用來對照對國民政府之失望。“總督府”轉化為“總統府”也表徵了權力如何自然化為國家支配台灣社會的神話。總督府一直是真實權力發號施令的中心，也持續是政治權力的象徵，也因此，即使在政治民主化過程中，它仍舊是諸政客們角逐政治舞台的最神聖光環。⁸儘管有這些不同，可是真正的不幸，卻正好共同存在於韓國與台灣被殖民經驗的核心，就是民（國）族國家竟然“複製”了日本國家對日本社會的滲透。這種經驗，一直到今天的民（國）族國家重構之後，不論是李登輝所謂的“新共和”，還是2000年總統選舉政黨輪替後自稱之“新政府”，仍是一脈相承，並未發生結構性地改變。對民（國）族國家的反省以及抵制力量，一直要到，隨台灣經濟發展後浮現的市民社會力量中，才得以慢慢建立起萌芽的社會自主力量。

三、殖民現代性之營造

然後，在殖民地之共同經驗上，我們進一步討論殖民建築與城市再現之共同性，殖民的現代性（colonial modernity），⁹即，日本殖民

8. 對兩個殖民總督府比較的進一步資料可參考：崔誠烈，夏鑄九（1995）。

9. 殖民現代性（colonial modernity）一詞，最早為美國的《Position》期刊之資深編輯湯妮·貝蘿（Tani Barlow）所提出，作為其創刊號之主題，由殖民主義與現代性論述的歷史同時性（historical synchronicity）考察東亞的歷史複雜性（Barlow, 1993:v-vii）。本文借用其措辭，做進一步之理論建構，賦予理論意義，指涉：沒有主體性之現代性。

時期台灣建築與城市之表徵就是殖民現代性之營造。那麼，什麼是現代性(modernity)？什麼是殖民的現代性？日本殖民城市與建築的殖民現代性建構過程又是如何呢？這有理論對話的意義。

假如我們將近年對現代性的眾多討論做一極度濃縮，在西歐，現代性被認為是“一種有活力的經驗方式(a mode of vital experience)，對時間與空間，自我與他者，生活的潛力與危險的普同經驗”(Berman, 1982:15)，這種經驗方式是一種“短暫的、無常的生活經驗”，卻流露出一種“霸氣”。這個為華特·班雅明(Walter Benjamin)反省的商品交換與機器複製力量，以及表現在貝隆·喬治-尤金·郝斯曼(Baron Georges-Eugene Haussmann)所闢建之林蔭大道與第二帝國之巴黎都市場景劇烈轉變，大衛·哈維(David Harvey)轉引自喬塞夫·熊彼得(Josef Schumpeter)，將其理論化為創造性破壞(creative destruction)(Harvey, 1989:16)。這種新的經驗方式為一種強制性的物質力量所支持。男男女女逐漸在生產之間連結的更近，科學與技術支持的強大生產力，國家官僚的有效治理，法治的社會組織，為自利與解除限制所驅動之個人生活，幾可視之為理性的勝利(Touraine, 1995:1)。現代性為影響全世界社會生活與組織方式，它是兩種不同的制度簇群與組織複合體：民(國)族國家與有系統的資本主義生產。這是兩大轉化性的作用者(transformative agencies)，是推動生活方式改變的一種西方計劃(a Western project)。現代性的基本結果就是全球化(globalization)，以及，反身性知識(the reflexive knowledge)的動態性格(Giddens, 1990:174-175)。

但是，這種現代性對第三世界，如日本殖民下之台灣，不但是經由殖民過程，經由軍事與政治之壓迫手段，歷史地強加於台灣城市與社會之上，而且是經由日本殖民者轉了兩次手移植入台灣的。這是台灣殖民城市之特殊性。或者說，日本殖民城市之“特殊性”，因為韓國殖民城市也有類似的特性。這是殖民之現代性建構，也是經由東洋轉

手之西洋。注意，它並不是西歐之現代性與日本的殖民過程兩者以算數相加而已。已如前述，日本殖民帝國之特殊性在於其天皇為中心之神道國家與民（國）族文化認同計劃，追求日本之獨特性與神聖性。經由殖民國家暴力建構的正當性，台灣第一次經歷了政治與軍事、科技與進步，以及，被殖民的台灣菁英人士中特有的次日人一級的文化優越性。經由都市計畫體制建立殖民城市則是殖民統治之手段。國家與資本結合，以殖民國家為主體，由上而下地建構起殖民城市之體系。殖民城市體系是殖民地政治經濟的控制中樞，也是殖民者行使政治經濟統治的戰略基地體系。由於宏大的都市計畫、建造壯麗的建築物、建設完整的都市設備，以安定內地人，是殖民統治的必要條件，¹⁰為的是使日本移民興起永住之心。¹¹也因此，驅動殖民地城市規劃的動力就是“衛生第一主義”。因此，由1899年開始的都市計畫體制，以至於1942年的大東亞共榮圈、國土計畫、區域計畫與國立公園計畫等，都是支持日本與其殖民地現代化的手段，一一貫穿國家之精神。¹²

在真實的社會政治過程中，帝國主義之殖民是以對領土的軍事與政治直接鎮壓為主要機制，殖民城市也是殖民國家機器鎮壓周圍鄉村地區之軍事基地，殖民城市內部與附近的軍事基地以武力統治，支持了不同層級殖民城市之改造。台灣的殖民城市可以由日本殖民之殖民城市（colonial cities）與反殖民城市（anti-colonial cities）這兩種主要的都市意義之對抗來說明。為了進一步分析，日本殖民台灣之殖民城市也可以分為幾個歷史區段（segments），做為協助我們組織史料的假設性範疇：(1)做為軍事政治鎮壓基地的初期殖民城市，(2)資本

10. 鶴見祐輔的觀點（1937:45），轉引自張景森（1993:9）。

11. 日本之移民村計畫之實際執行，由於日本的農業移民幾乎無法與漢族競爭而生存困難，不易定居台灣，戰後，則全數返回日本（若林正文，見松永正義、劉進慶、若林正文編著（1995: 43-45）。

12. 參考越澤明（1986）、黃世孟（1987）等之研究與張景森之博士論文（1991），或是張景森（1993），第二章，本書為張景森博士論文部分濃縮出版，提供了對整個台灣都市計畫史的銳利分析。關於阿里山國家公園的分析，則見林秀姿（1993）。

主義改造的殖民城市，(3)鼓吹大和民(國)族神聖性的戰時統治殖民城市(夏鑄九，1994:4-7)。

在配合都市功能改造之層次，殖民城市的資本主義改造，殖民者用：(1)鐵道建設，(2)市區改正，做為殖民者協助界定區域與都市管理的工具(黃蘭翹，1995)¹³。在都市象徵支配之層次，殖民者對舊城的“刮去重寫”，空間肢解與抹除重拼(respell)，使得新記號塗銷(erase)了舊標記的“落後”污點，何況，這也符合矢內原忠雄所說：“使台灣脫離中國而和日本結合”的目的。¹⁴日本對台灣的殖民城市之都市形式可說是殖民者的紀念碑，殖民者以“西歐古典”的空間文本向被殖民者宣示“現代文明”的理性，這是“文明生活”。日本1874年出兵以來，就認為台灣是未經開化的“蠻荒之地”，¹⁵是穿透被殖民的“處女地”，有殖民之正當性。總之，是“殖民現代性”之建構。

這些殖民城市之經驗方式，值得與歐洲的城市，尤其是巴黎，做理論對話。¹⁶前述之無常的現代性經驗，在郝斯曼的瓦礫中產生，且被熊彼德轉化為企業家的英雄形象。這是創造性破壞，一種普同的現代性，正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再現(Harvey, 1989:16-18)。尤其要指出的，這是一種**自我摧毀的主體經驗**，貫穿在現代藝術與建築前衛者之靈魂深處。換言之，現代性的客體向度扣連著社會經濟過程，而其主體向度卻是連結著個人的經驗、藝術的活動、或是理論的反省(Heynen, 1999:10)。這個對未來充滿不確定挑戰的主體性，也可

13. 青井哲人(Akihito Aoi)對今天的中山北路圓山、台南延平郡王祠在日本殖民時期所“增建”的神社的考察，很清楚地說明了這整刮去重寫、重拼、與塗銷落後的營造過程(青井哲人，2000)。進一步的神社營造資料可以參考青井哲人在2000年3月的京都大學博士論文。

14. 轉引自若林正文，見松永正義、劉進慶、若林正文編著(1995:32)。

15. 見松永正義，“台灣，面對未來的挑戰”，松永正義、劉進慶、若林正文編著(1995:10)。

16. 這也是與法國巴黎貝勒維勒建築學院，巴黎第十大學南代分院的皮埃爾·克萊孟(Pierre Clement)教授所主持為期兩年之研究計劃：東亞地區城市發展研究。本文作者負責研究台北的都市形式與都市經驗之歷史轉變。

以視為是市民社會活力與個人創新經驗的泉源。此外，在理性與主體間的對抗，正是人類感覺的活動，或者說，實踐的主體性建構的根源。¹⁷

然而，日本殖民台灣的城市與建築經由“刮去重寫”的**創造性破壞** (creative destruction)，對台灣的被殖民者而言，卻是一種**破壞性創造** (destructive creation)。這個第一手的移植過程，也就是為國家所主導的由巴黎到東京的移植過程，我們還需更多的分析，但是，對台灣言，我們最刻骨銘心的過程是，第二手的由東京到台北的移植中，表現的這種“新的”經驗方式，流露出殖民城市的**次序、理性、與肅殺**。我們由台灣殖民城市中的街道佈局、街廓組織、土地分割、建物類型、公共空間與量體關係……等等可以清楚再現這個破壞性創造的歷史過程。在殖民國家強調的現代正當性之下，殖民社會是種依賴社會，其成員沒有主體性，沒有自我，也沒有給予意義的能力與權力。簡言之，一個被殖民國家框架住的，由上而下所強加的領導權。因此，即使在客體層次上，台灣有了一些技術、法治、衛生¹⁸、教育¹⁹與官僚效率，反而卻無由產生個體之自覺，主體之反身性 (reflexivity)，這也就是**主體 (Subject) 缺席之殖民現代性**。這是一個沒有市民社會的自主性，沒有市民的公共空間之殖民城市。殖民城市中即使是複製與移植了實質的公共空間，也仍然是“偽公共空間”，因為沒有“政治”。沒有“政治”，就沒有“公共領域”。反而，不同於“三市街”中老市中心，如大稻埕的都市空間狹縫，正式的殖民城市的中心廣場，台北公會堂 (1936 年落成，今天的台北市中山堂)，一直以嚴肅而沈默的正面鎮攝它面前的仿歐廣場。它的旁邊竟然是警察總局。因此，這裡沒

17. 作者認為何妨回到費爾巴哈提綱對實踐之主張做多一點思考？

18. 衛生症候群 (sanitation syndrome) 在傅柯影響下已經成為各殖民地知識考古學共同研究的題材，殖民者對健康之關心，一則是功能性的，因為殖民者水土不服，二則關係現代性之建構。它是支持都市計畫的動力。可以參考：張景森 (1993:10)。

19. 總督府推行同化政策，引進天皇制教育，日本人進入小學校，漢人係子弟進入公學校，這是殖民地之差別待遇。

有市場的商品活力與混亂，也沒有市民論壇的輿論發言與喧嘩。在這裡，後殖民時期人民第一次出席政治參與，就開啓了二二八屠殺的序幕。以致於，這廣場長期成爲警察局的警車停車場，從來也不曾是城市市民真正的公共空間。當然也更不必說近年廣受討論的，爲台灣市民社會所支持，在婦女與男女同志團體所追求的，做爲對抗性公共空間，或者說，反公共空間（counter public spaces）的“新公園”（即台北公園，今日的二二八和平紀念公園）所表現的多數的公共（publics）與異質的市民了。²⁰

也因此，這個工業化、都市化與現代化過程是殖民的歷史過程，也是殖民城市最主要的都市經驗，竟是不能建立主體之苦悶。它糾結了認同上的壓抑與委屈，糾纏了自卑與自尊。結果，在戰後回歸祖國的過程中，這種吳濁流在無花果中所說的“孤兒意識”的委屈，竟然未得到情感上的補償，反而爲國民政府之腐敗所傷害，以二二八事件爲代表，五〇年代白色恐怖之壓迫，省籍情結於是成爲國家暴力之代價。而國民政府右翼政權所長期提供之反共土壤，讓日後國家權力重構時，輕易地成就爲新民（國）族認同計劃之溫床。因爲，民（國）族主義建構必須的他者（異己）（敵人），就是曾經經歷革命，而由馬克斯主義摸索現代性的中國。這也讓台灣的後殖民社會必須一再承受民（國）族認同上的分裂所帶來的難以明言的情緒。

在殖民城市研究的個案上，台北，雖然因殖民者致力在次級城市之農業加工原因，都市首要性（urban primacy）的程度並不高，仍然在清代府城與省城基礎上發展成爲殖民地人口與財富集中的大城市（夏鑄九，1988:284; 1994:4-5；徐裕健，1993）；而宜蘭則是地域性中心城市中的好例子（陳志梧，1988）。這些作者們已經對台北市與宜蘭市的個案提出了初步的分析，尤其是在空間文化形式之象徵表現方面做出了突破性的貢獻，使得我們可以在他們的基礎上對建築形式與空

20. 可參考賴正哲（1998）與謝佩娟（1999）的論文。

間經驗，進一步討論建築形式與主體性建構之關係。台灣的殖民建築與城市的研究中，我們還未有實力產生像女性主義的地景建築史學者陶樂斯·海頓 (Dolores Hayden) 的《地方的力量：都市地景作為公共史》(1995) 這樣的著作，也見不到像女性主義的建築史學者黛安妮·吉拉度 (Diane Ghirardo) 正研究的題材——義大利重要的文藝復興城市費拉拉 (Ferrara) 的女性空間地形。她藉著秦樓楚館與下層階級婦女在城市生活中的空間位置，再現了當時城市之社會結構，重新看見了過去所不為人們注意，而卻是真實城市生活的底層部分。目前，在大稻埕婦女日常生活史部分，有了一點點起步 (陳惠雯，1999)。這些剛起步的研究雖然還談不上什麼研究成果，但是，它提醒我們，研究殖民城市時不可遺忘的對立面，反殖民城市。越沈重的殖民城市壓迫紛圍，其實正好表現了看不到的反殖民城市力量。在我們討論，最為重要但目前成果不彰的反殖民城市之後，我們在本節最後將再用兩個小例子分析建築的形式做為本節之結束。

殖民的現代性中之缺陷既然是主體之歷史性缺席，社會與被壓迫者之活力只有往**敢於向殖民者對抗的力量中尋找**。反殖民城市則將殖民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矛盾與民 (國) 族矛盾，甚至與性別矛盾糾結為一體，提出了不同的主張，特別值得我們進一步研究。在前述之殖民過程所形成的整體中，所謂“本島人”是被統治的“二等國民”，因為他們原是未經“現代化的”“清國奴”。即使到了皇民化時期，同化政策“改姓名”的結果，在六百萬住民中也不過十幾萬人而已。被收編的上層菁英，造成了認同之錯置。²¹台灣殖民社會之資本主義分化與前述之二重構造，使得農民以至於後期的勞工，是制度裡被剝削、被異化的主要對象。至於更受到種族歧視的，在皇民化下所稱的“高砂族”，則是殖民社會的最底層。因此，反殖民城市也相應在不同的階段，以不同的形式出現。譬如說，早期全島性的激烈武裝抗日，以致於在1915年以最後的西來庵事件的武力抗日與屠殺告終。至於1920年代日本資本形成獨佔之後，催逼出蓬勃的布爾喬亞所領導的民族運動，

到了 1930 年代後，則因農村貧困化而發展成爲階級的運動，使我們並不難看到文化協會、台灣民眾黨、台灣共產黨的活躍，與農民、勞工運動之發展（陳志梧，1988:250）。他們的成員，在大稻埕、台中……等地留下無數演講與聚會的報導，甚至在都市真實空間上之痕跡。作爲殖民城市，日人將京都做爲台中都市形式塑造的範本，鴨川與白川就是綠川與柳川。然而，做爲反殖民城市，台中更可以說是文化協會的基地城市，所以也被稱爲是“文化城”。可惜中央俱樂部（中央書局）、樂舞台、與醉月樓等地方都已消失，沒有機會再保存了。只剩下台中中學（今台中一中）作爲台人第一間自己創辦的中學還存在著。²²至於有名的霧社事件等原住民抗日之遺址，以及在南投、新竹、嘉義等之原住民鄉，現在都還可以找到足資保存的原住民抗日遺址。

前述殖民城市與反殖民城市之間，相互對抗的，以及複雜的糾結的關係，共同建構了殖民城市之都市功能與都市形式。將城市做爲政治與文化對抗的基地，除了做爲反殖民政治活動的舞台，還是一種符徵再現，尤其是在空間的表徵（再現）（representation of space）層次上表現反抗的意義。這是受壓迫的殖民城市中有社會與文化活力的經驗，也構成了反殖民城市的集體記憶。作者強調，這是殖民城市台灣社會與文化活力的展現，由於反殖民城市仍是歷史研究者成見下視而不見的城市，這方面的成果還需要由口述歷史、總督府之警察沿革志、或是甚麼名爲“匪亂”的邊緣史料中去重新閱讀。相反地，由警察局的配置其實就可以重繪出反殖民城市的地圖。舉例言，由前述在台北“城內”的公會堂旁邊佇立的警察總局，到漢人聚落的“三市街”中的派出所，如插在大龍峒四十四坎、保安宮、孔廟、與大龍國小之間，道路中的蘭州派出所，以至於到今天的原住民鄉的“警光山莊”

21. 這認同經驗之錯置又爲日後國民政府統治之劣行，如 228 事件等，所進一步強化與扭曲。

22. 台中中學校園中的創校紀念碑上的字正是：“吾台人初無中學，有則自本校始。”（大正四年創校碑）（這是鄭梓提供的資料）

與警局派出所的位置，其實都是殖民者“監控”眼神的具體化，值得我們由反殖民城市之角度，重新讀出無聲的被殖民者之感受。殖民城市的都市公共空間被迫在狹縫中建構，台人在警察監控中聚眾，有技巧地議論政治，突破殖民者之限制，值得我們進一步由空間表徵（再現）、表徵（再現）的空間、與真實空間中之互動，進一步闡述反殖民城市之動力，以及，與認同政治間的複雜關係。反殖民的抗爭空間建構，是透過文化講座、讀書會、文化書局等，躲過警察的空間監控，經由初浮現的都市公共領域，即報紙傳送，爭取被殖民者間之認同。工廠是生產場所的抗爭，同時，劇院、餐廳、公園、馬路、市場、書局等都市空間，做為集體消費的都市元素，也提供了抗爭的空間。戲劇、文學、歌謠等再現的文本，召喚被壓迫的感情與經驗。²³

因此，反殖民城市之歷史告訴我們殖民城市與反殖民城市間絕不是單純地兩元對立之對抗，令被殖民者最難堪的事實就是，被殖民者身上，由於模仿過程，欠缺主體對自身之反身性自覺，竟然繼續複製了原先它的對立面。經由反抗的過程，被壓迫者竟然變成了原來的殖民者價值觀之俘虜，成為殖民者價值之再現者。由於被壓迫的怨恨而無能以鏡中之象反省自身的不堪，它遂不自覺地模仿它不喜歡的，但是卻壓迫自己的殖民者，以“其人之道還制其人”反制支配的力量，結果，沒有建構自我，反而是造就了無主體之自身，複製了原先壓迫者所有的惡行。於是，在去除殖民之後，隨著殖民者留下的是再生產之內部殖民。這種殖民現代性歷史地糾結了自身的父權文化與權力的印記，建構出自身都認不得的保守自身——**傳統文化與現代民（國）族國家暴力的混合體**，對付自己社會中的弱勢者。至於民主，反而被視為是陌生的外來文化，淪為民粹主義權力操弄的說詞了。

本節最後，作者沒有忘記殖民建築史研究者不能忘情的對象，我

23. 鄭文良的論文雖未能清楚地說明反殖民城市與認同政治間之種種糾葛，算是一種初步嘗試吧（鄭文良，1996：156）。

們用兩個最近因被指定為古蹟而引起討論的兩個例子做為討論對象：台灣大學法學院前後排教室與建中紅樓。前者，台大法學院係日據時代台北高等商業學校舊址，1919年成立，至1943年改為經濟專業學校。後者，建中則係台北第一中學校，初為台灣總督府日語學校附設尋常中學科，招收日籍子弟。1921年紅樓竣工，1922年定名為州立台北第一中學校。

首先，這些建築物雖然建造在廿世紀初，用我們前述之世界史角度要求，這個時候西方國家已經是現代建築運動（Modern Architecture Movement）風起雲湧之際，甚至現代建築已逐步開始取得了學院與社會的主導權了。然而，在台灣，由於是日本殖民地，當時的公共建築物，由於殖民者的殖民統治政策與文化支配政策，有意圖地引入西歐十九世紀古典建築之語彙，表現殖民帝國之權威。²⁴這可以做為整體性的思考日本殖民建築之歷史角度。

其次，由於這些西歐古典建築語彙是經由日本殖民者詮釋與移植，所以，形式語彙之“模仿”並非完全相同，可說有一點“走了樣”，這與上海、青島……等英、法、德屬殖民地，甚至是西歐殖民宗主國之建物相比較便很清楚。不論是尊貴如今日之台北賓館（台灣總督官邸），還是一般學校建築均然。這種形式語彙上不一樣的“走樣”，重點不在於準確重現西歐之“標準”與否，而是日本殖民現代性的特殊性所在，日本神道國家與民（國）族神聖性已經經由一種日本獨特性中的理性，表現了建造技術上的嚴格準確、貫徹施工細部與材料中的意志，以及，古典權威形式裡透露的嚴肅精神，一種軍事威嚴。²⁵因此，日本殖民建築之形式語彙硬要做為區分形式的範疇，其實有一點勉強。不過這種難以套合，並不是問題。這種“走樣”不正好是台灣的日本殖民建築其形式經二次轉手後之特殊性所在嗎？歷史研究之任務

24. 由鶴見祐輔之著作，我們得以知道這是由後藤新平開始有意識的政府行動。陳志梧對這方面有很深入的分析（陳志梧，1988,1989:244-248）。

25. 台北賓館（台灣總督官邸）是最值得與法國巴黎的對應個案比較的例子。

正好不在於評價，而在於意義“詮釋”。問題還是在方法上，也就是說，這些形式範疇的社會與歷史脈絡必須掌握，不然，歷史研究者之主體性就無由建立了。舉例說明，十九世紀西歐古典建築的語彙基本上是一種“復古”的態度，主要是古希臘與哥德（Gothic）。新古典主義的語彙在做為殖民地的美國也持續了相當時日，曾有段時間，仿羅馬（Romanesque）也因其形式較樸拙，受到相當喜愛。在英國，哥德建築受到相當垂青，由一種“浪漫的哥德”（對中世紀的鄉愁），到相當精緻小心的模仿——被當作是一種宗教上的必要元素，如奧古斯都·維比·諾司莫爾·普金（Augustus Welby Northmore Pugin）就是最好的例子。當然，哥德式樣不僅用於教堂，也用於旅館、法院與醫院等建築物，影響極大。以至於移植到了美國，有相當長的時間，幾乎等同於大學校園的知識貴族所特別需要的“象牙塔氛圍”，或高貴的知識與身份薰陶所必要的空間形式元素。

在現代主義（modernism）之領導權支配的年代，歷史風格被直接套用，在現代建築史家、評論家（今天都已被視為是現代主義的“鼓吹手”，不是什麼號稱“客觀”的建築史學者了）與建築師的眼光來看，被視為是一種沒有想像力的“直譯主義”。但是，也正因為如此，我們經由歷史的眼光，其實反而可以看到這種風格（式樣）的直譯主義者所對應著的“既定的”支配性價值觀，或者說，意象化了的意識形態（imaged ideology）吧，這不正是看不見的權力關係嗎？因此，羅馬式樣常對應著公平正義，威尼斯式樣則常被聯想著商業，而東方，可被用於與“休閒”相關之地方，而希臘，因是西歐中心文化的源頭，則被國家有意地連結上政府建築物，是最支配性的“公共”。當然，隨著時間，這些形式上的折衷借用，其意義指涉也變得越來越普遍而模糊了。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十九世紀的古典語彙直接關係著當時西歐十八世紀起民（國）族精神的打造，譬如說，最有名的德國科隆大教堂的紀念性，就與日耳曼民（國）族“神話”建構有直接關係。這方面，一直可以追溯到以黑格爾右翼思想為主體的德國學院派藝術史

——建築史傳統，以時代精神 (Zeitgeist)、民族精神 (Volksgeist) 的知識論觀點了。

因此，建築語彙實在不宜孤立地對待，更不宜孤立地玩弄“形式類比”、“分類”的工作，這些是缺乏方法論自覺的學者，又有意無意地偷渡其專家判斷與品味的態度。相反地，我們反而需認識的是，這種建築語彙，是在什麼歷史脈絡下，被什麼人，基於什麼原因，用什麼方式，“模仿”與“移植(transplanted) (特別是殖民地，如台灣)？它表達了什麼意義？這些意義又有什麼樣的可干預的破綻與日後的變化？

那麼，台大法學院建物與紅樓的立面與正面 (Facade)，基本上都是表現了西歐古典語彙中“折衷式”的“仿哥德”元素，可是，它模仿的又極簡單，有點“走了樣”，但是，“走了樣”的原動力仍是“殖民者”的（不是“本島人”的）中等與高等教育所需要的殖民知識階級薰陶的空間氛圍。做為教育的地方所創造的空間經驗，對實際之使用者（接受者）日本人言，這是確保文化再生產的基地，是國家制度中階層化勞動力的官僚體系一部份。它的破綻是，做為學習地方，它表現的權力慾與控制慾，其實遠大於刺激知識、啓發創新氛圍所需的開放性。至於對不存在的使用者本島人言，這裡都是不能進入的殖民知識貴族之陌生殿堂。這種種破綻，其實核心就在於殖民現代性（經驗方式）中主體之缺席，這却正是教育的靈魂，學習過程中有機會產生“青出於藍”的主體積極性之根源。

由上述的例子，作者想指出的是對殖民建築之歷史研究中，其詮釋之關鍵動力即在於主體性建構，一旦重建研究者之主體性，**歷史則是充滿破綻之歷史**。經由實踐，歷史寫作，我們開啓了無窮無盡的對話空間，干預建築，干預在現實中的真實空間。也因此，我們不宜去爭論什麼：在日本殖民建築的清水紅磚造建築物之中去建構什麼“典型的紅樓”。或者甚至還說，台灣大學法學院前後排教室比建中紅樓更具“代表性”？這些不是研究的問題，根本是問錯了問題。在被殖民的

現實中重新發問，歷史寫作可以解除神話，探索歷史的循環，在破綻處讓無聲的他者發言，如農民、勞工、原住民、婦女，在不斷的對話中重寫歷史，這不是“歷史的計劃”（the historical project）嗎？

建築做為一種真實空間中之象徵表現，或者說，空間的文化形式，我們必須面對其物質地、物理地存在實質空間的特殊性之一，就是殖民已去，而建築猶在。這在前面台灣巡撫衙門、台灣總督府與總統府之關係時已經觸及。後殖民年代中的紅樓，新的管理者把清水紅磚表面塗上其他塗料以示其新，就是另外一種通俗美學的表現了，它被漢寶德譏為“民族文化美感的墮落”，一針見血。就本文的核心概念，殖民的現代性言，追究台灣的後殖民建築品質粗劣的一部份歷史原因，或許與此有關。後殖民建築，做為一種現代工程技術，少了日本殖民者現代化過程中的那份對技術與材料的專注與執著，再加上，從未在台灣的殖民建築中出現過什麼主體性，也使得台灣的建築無法累積建築之所以異於工程的“文化”或“人文”的特性。這已逐漸遠離了本文主題，然而，卻是作者以殖民建築之反身性認同提出結論的時候了。

四、自身歷史感之重建——反身性認同

在前述之殖民現代性之討論基礎上，我們才得以歷史之距離，建構批判的現代性，尤其，在質疑歐洲/日本中心性與獨特性預設下，重寫被殖民的他者（異己）之歷史。假如缺乏主體性，也就無由建構對殖民之歷史距離。以主體之實踐，重新連結在現代性中的理性化（rationalization）與主體化（subjectivation）兩個側面。主體是一個意志的行動，以及被辨認為一個行動者（actor）。在後殖民與後傳統的脈絡裡，經由一種反身性的計劃（a reflexive project），經由反身性認同將個體（individual）轉化為自我認同（self-identity）。²⁶反身性自覺是所有人類行動的特性，是現代性固有成分的制度性反身之特

26. 可參考：Touraine (1995: 207)，Giddens (1991:53)，Castells (1997:10)。

殊條件 (Giddens, 1991:35)。

難怪華盛頓郵報特派員潘愛文 (John Pomfret) 在 2000 年 6 月發自台北的專文，引述“二二八紀念館”對日本殖民台灣的描述：

“日本統治者改善了台灣的教育和醫療，建立了獨立的司法制度，打擊犯罪，建設道路與鐵路，提高生活水準。日本在台灣現代化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因此，潘氏以李登輝與辜振甫為例，認為台灣老一代人普遍對日本存有好感，說明台灣的認同特色。要理解這種前引之紀念館歷史詮釋，其實與“哈日”與否，關係不大。這是以政府的紀念館，以官方與客觀之名，偷渡了成見，而這成見卻正是缺乏了主體性建構最需要的“反省現代性”之距離。這原因正在於：殖民的現代性為不能建立主體性的苦悶所煎熬，它是個主體缺席的現代化建設過程，所以連在日本殖民者前爭取平等的能力與勇氣都沒有。殖民者其實是掠奪者 (usurper)，但是，殖民者“佔了便宜還賣乖”，在文化上與論述上建立自己掠奪的正當性，以正當化認同合理化其支配性。而被殖民者最尷尬的困境正在於，後殖民的壓迫者²⁷正好是複製了殖民者的文化成見、制度、生產方式，進行社會內部之殖民。其中，民(國)族主義是必須深切反省的關鍵問題，以致於在後殖民時期，以發展主義為手段的民(國)族主義得以長期成功地穿透了台灣社會。非洲殖民經驗中的掠奪者角色 (the usurper's role)，即，尼祿情結 (the Nero's complex) 永遠之煎熬，其不能建立主體之苦悶正是由於其自身無能反省。²⁸我們豈能期待這些“個體”能經由殖民國家所支配之“正當化認同” (legitimizing identity) (譬如說，民(國)族國家計劃)，跳躍過反殖民的“抵抗性認同” (resistance identity)，又收編了“計劃性認同” (project identity) (譬如說，女性主義之性別認同)，而建構

27. 他們還不見得是曾經參與過抵抗運動的被殖民者，甚至，經常是參與在殖民計劃中的既得利益者。他們沒有經過反殖民的過程，就接收了歷史的勝利果實。

28. 這是洪國鈞由雅伯·敏米 (Albert Memmi) 角度提出的看法。

主體性？

韓國的學者白永瑞以安徒生童話中的紅舞鞋為喻——穿上紅舞鞋的少女舞姿博得了眾人的稱讚，但是卻被舞鞋驅趕著不停地跳，無法停下來，少女精疲力竭卻無法脫下舞鞋，無奈被迫截去了雙腳——提醒我們東亞國家建構“國民”的“強國夢”正是少女被套上了紅舞鞋（白永瑞，1999:3）。這不就是殖民現代性的計劃嗎？失去了主體性的現代性計劃嗎？這是一種多麼令人心悸的經驗方式啊！殖民現代性經驗的重要性在於，這是一種無主體反身的過程。在這種過程中，被殖民者自己模仿了掠奪者的觀點、價值與精神狀態，模仿著日本的“亞細亞主義”與“西洋”帝國主義，建構“國民”，由“發展”而“強國”。即使博學如於日本殖民時期來訪過台灣的梁啟超，也是通過日本而吸收了西方思想，將之變通為中國之改革思想，引入民（國）族主義，期待黃種人有朝一日能與白種人爭勝，卻露骨地把其餘的有色人種“棕黑”蔑視為懶惰之種族。而朝鮮的激進改革派《獨立新聞》中則認為朝鮮在成為文明開化國家後，可以參加瓜分和支配中國。這種缺乏反身性的狀態，一直要到了一次大戰後的李大釗，才以亞洲被壓迫民族的解放為前提，提出新亞細亞主義，要求日本先承認亞洲各國的責任與地位，然後進一步為世界的人道做貢獻（白永瑞，1999:3-5）。這種殖民現代性的經驗，一如對現代性的批判，對殖民現代性之批判更是主體建構的必須過程。沒有反身性空間，就算是有了抵抗空間，也仍然在實踐中無法產生另類的空間。

與歐洲的德國經驗對照，日本本身也正由於對過去之殖民歷史欠缺反身勇氣，²⁹因此與相鄰之亞洲各國之間很難突破民（國）族國家肯

29. 就以慰安婦為例，日本皇軍在二次大戰期間綁架了約二十萬亞洲婦女充當慰安婦，生還者在戰後還要忍受親生孩子被奪走、遭丈夫遺棄及社會異樣眼光的對待，不僅未受到賠償，絕大多數壓迫者仍逍遙法外，日本政府數十年來也不斷拒絕承認此一性暴行（聯合報，2000年，9月19日）。一直到了2000年12月12日，由非政府組織的團體在東京主辦的“女性國際戰犯法庭”（Women's International War Crimes Tribu-

定自身民（國）族獨特性的限制。在全球化的年代展望亞洲政治，不容易有機會，像統一歐洲那樣，以網絡國家（network state）探索新的社會與政治之組織形式。³⁰

至於台灣社會“內部殖民”的衝突，如前所述，雖不盡符合本文對殖民的界定，也有必要與日本殖民的性格加以區分，但是，做為有反省力的研究角度，對漢人城市主要特色的分析，並不能忽視急遽發展的漢人農業聚落對農耕土地的熱切需求與原住民部落之間的衝突。作者必須重提其重要性以為本文之結論。這衝突不但是平埔族部落消失的主因，更表現在“隘勇線”與“土牛溝”的空間隔離上，這是漢人與原住民族群衝突關係在時間與空間上的表現。不止於此，這還是漢民族“飲食”文化論述，將原住民由“生”至“熟”，將“自然”對比“文化”，的表現（Chiu, 1994:141-142）。更深刻的問題是，前述殖民者對森林的雙重標準與對台灣森林之掠奪性破壞政策竟然在後殖民時期繼續這種殖民結構，而原住民的在國家的現代化政策下，原有的維生經濟與政治社會結構受到進一步破壞。伴隨了漢人對土地的貪婪，甚至連地震的重建過程都不放過，平權會所持續的就正是漢人對原住民之內部殖民。³¹要避免永遠的壓迫、苦悶、悲情、與內部殖民與後殖民的困境，唯一的解決之道在於反身的能力，對現代性的反身能力，從而由主體之計劃性認同建立行動者實踐的能力。而主體性建構之關鍵正在於反身的能力。我們共同追求台灣的主體性，可是，珍貴

nal on Japan's Military Sexual Slavery)的審判長、原南斯拉夫戰犯法庭大法官麥克唐納宣布：“昭和天皇裕仁及日本政府有侵害人道罪，日本政府應向受害女性誠懇道歉並實施國家賠償”。主辦代表松井耶利表示：“經過十年的努力……，判決結果是給日本政府挽回名譽的最後機會。……除朝日新聞之外，記者的稿件很難在日本國內媒體上出現，……這次的法庭考驗了日本的民主主義。”（亞洲週刊，2000年，12月18日-12月24日）

30. 統一歐洲搜索網絡國家請參考：Castells (2000:第五章)。

31. 關於平權會研究，見：顏玉珍，張毓芬 (1999)；關於 921 地震後之和平鄉原住民之地方認同與原住民之土地權問題，見：(Chen, 2000)。

的主體性只能建構在有反身能力的主體身上。歷史工作者必須以有反省性之反身認同，重建自身之歷史感。這是歷史創造與實踐中摸索所必須的歷史感，也是展望明日之台灣城市與建築之視野。面對為一波猛過一波的倉促人類活動所翻攪，一層層被塗掉重寫的台灣地景，像都市考古學式地追溯痕跡，殖民現代性營造的歷史，其實是為不斷的歷史對話所重寫的歷史。這是推動社會與空間轉化的實踐所不可或缺的另類空間之條件。

參考書目

中文部分：

- 白永瑞，1999，〈世紀之交再思東亞〉，《讀書》，8月，pp.3-8。
- 林玉茹，1993，《清代台灣港口的空間結構》，台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林秀姿，1993，《一個都市發展政策的形成——1920-1940 家意識接政治面的觀察》，台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林滿紅，1978，《茶、糖、樟腦業與晚清台灣》，台銀研究叢刊 115，台北：台銀經濟研究室。
- 松永正義、劉進慶、若林正丈編著，1995，《台灣百科》（增訂本），台北：克寧。
- 侯怡泓，1989，《早期台灣都市發展性質的研究》，台中：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 施添福，1989，〈清代台灣市街的分化與成長：行政、軍事和規模的相關分析（上）〉，《台灣風物》，第 39 卷，第 2 期，pp.1-41。
- 章英華，1986，〈清末以來台灣都市體系之變遷〉，《台灣社會與文化變遷》，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專刊乙種第 16 期，pp.233-273。
- 夏鑄九，1988，〈空間形式演變中之依賴與發展——台灣彰化平原的個案〉，《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1 卷，第 2.3 期合刊，夏、秋季號，pp.263-379。

- 夏鑄九，1994，〈都市象徵之理論摘要〉，香港中文大學主辦之《都市中國之建築發展，1898-1937》國際研討會論文，1月4-6日。
- 夏鑄九，1995，〈台灣的都市變遷：一個都市考古學的提綱〉，《文明史上之台灣》國際研討會，台灣大學日本綜合言繼中心主辦，台北，台灣大學法學院，10月15日。
- 夏鑄九，1997，〈都市史之理論反身——從戴奧斯、考斯多夫到柯斯特〉，城市與設計，第一期，六月，頁51-74。
- 夏鑄九，崔誠烈，1995，〈兩個殖民總督府〉，《台灣建築報導》，第一期，10月1日。
- 徐裕健，1993，《都市空間文化形式的變遷：以日據時期台北為個案》，國立台灣大學土木工程研究所博士論文。
- 陳志梧，1988，《空間變遷的社會歷史分析：以日本殖民時期的宜蘭地景為個案》，國立台灣大學土木工程研究所博士論文。
- 陳志梧，1989，〈日本帝國主義下宜蘭城的空間轉化〉，《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一卷，第二、三期合刊，夏/秋季號，頁231-262。
- 陳惠雯，1999，《大稻埕查某人地圖》，台北：博陽。
- 張景森，1991，《台灣現代城市規劃：一個政治經濟史的考察（1985-1988）》，國立台灣大學土木工程研究所博士論文。
- 張景森，1993，《台灣的都市計畫（1985-1988）》，台北：業強。
- 越澤明，1986，（黃世孟譯）《滿州都市計畫史之研究》，台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研究所。
- 黃世孟，1987，《日據時期台灣都市計畫範型之研究》，台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研究所。
- 黃蘭翔，1995，〈台南十字街空間結構與其在日據初期的轉化〉，《台灣社會研究季刊》，No.19, pp.31-60。
- 鄭文良，1996，《阿信與總督：日據時期反殖民城市文化史研究》，國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論文。
- 賴正哲，1998，《在公司上班：新公園做為男同志演出地景之研究》，

私立淡江大學建築研究所碩士論文。

謝佩娟，1999，〈台北新公園——同志運動：情慾主體的社會實踐〉，
國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論文。

顧玉珍，張毓芬，1999，〈台灣原住民族的土地危機：山地鄉‘平權會’
政治經濟結構之初探〉，《台灣社會研究季刊》，No.34, pp.221
-292。

外文部份（含中譯）

AlSayyad, Nezar (ed.), 1992, *Forms of Dominance: On the
Architecture and Urbanism of the Colonial Enterprise*,
New York: Avebury.

Aoi, Akihito, 2000, "Urban Planning and Religious Policy in the
Japanese Colonies: Reconsidering the Temple-Shrine
Reduction Movement in the Colonized Taiwan", paper for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the Urban and Architectural
Histories under Colonial Rule in Asia, the Institute of
Taiwan History Preparatory Office (ITHPO) and the Pro-
gram for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PROSEA), Academia
Sinica, Sept. 6-7, 2000. (in Japanese)

Barlow, Tani, 1993, "Editor's Introduction", *Position*, Vol.1, No.
1, Spring, pp.v-vii.

Berman, Marshall, 1982, *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 The
Experience of Modernity*, London: Verso.

Castells, Manuel, 1997, *The Power of Identity*, Oxford: Black-
well.

Castells, Manuel, 2000, *End of Millennium*, (Second Edition),
Oxford: Blackwell.

Chiu, Fred Y.L., 1994, "Some Observations on Social Discourse
Regarding Taiwan's 'Primordial Inhabitants'", in Mar-

- shall Johnson and Fred Y.L. Chiu, (eds.) *Unbound Taiwan: Closeups From a Distance*, Chicago, Ill.: The Center for East Asian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Select Papers Volume No. 8, pp.133-154.
- Chen, Yi-fong, 2000, "Indigenous Peoples' Land Right,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Place Identity after the September Earthquake: Case Study of Ho-Ping Hsian, Taichung County, Taiwan", paper for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Critical Geography Conference, Taegu, Korea, 9-13 August.
- Fraser, Derek and Anthony Sutcliffe (eds.), 1983, *The Pursuit of Urban History*, London: Edward Arnold.
- Funo, Shuji, 2000, "Modern World System and the Formation of Colonial Cities", paper for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the Urban and Architectural Histories under Colonial Rule in Asia, the Institute of Taiwan History Preparatory Office (ITHPO) and the Program for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PROSEA), Academia Sinica, Sept. 6-7, 2000.
- Giddens, Anthony, 1990,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Giddens, Anthony, 1991, *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 Self and Society in the Late Modern Ag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Harvey, David, 1989,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An E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Change*, Oxford: Blackwell.
- Hayden, Dolores, 1995, *The Power of Place: Urban Landscapes as Public History*,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 Heynen, Hilde, 1999, *Architecture and Modernity: A Critiqu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King, Anthony, 1990, *Urbanism, Colonialism, and the World-Economy*, London: Routledge.
- King, Anthony (ed.) ,1997 , *Culture, Globalization and the World System: Contemporary Conditions for Representation of Identity*, Minnesota, MI.: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King, Anthony (ed.), 1996 , *Representing the City: Ethnicity, Capital, and Culture in the Twenty- First Century Metropolis*,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 Kostof, Spiro, 1986, “Cities and Turfs”, *Design Book Review*, No. 10, Fall, pp.35-39.
- Maruyama, Masao, 1963, *Thought and Behavior in Modern Japanese Politics* (ed. Ivan Morris) ,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Nakashima, Koji, 2000, “Nationalism, Colonialism and the Representation of Nature: Forest and Country in the Afforestation Campaign in Modern Japan”, paper for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Critical Geography Conference, Taegu, Korea, 9-13 August.
- Porphyrios, Demetri (ed.), 1981 , *On the Methodology of Architectural History*, London: Architectural Design.
- Tafuri, Manfredo, 1980, *Theories and History of Architectur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Touraine, Alain, 1995, *Critique of Modernity*, Oxford: Blackwell.
- Vale, Lawrence, 1992, *Architecture, Power, and National Identit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Wakin, David, 1980, *The Rise of Architectural History*, Chicago, Ill.: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 Wheeler, James O., and Clifton W. Pannell, 1973, “A Teaching

Model of Network Diffusion: The Taiwan Example”, *The Journal of Geography*, May, pp.21-31.

Wright, Gwendolyn, 1991, *The Politics of Design in French Colonial Urbanism*, Chicago, Il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Yasushi, Goto, 2000, “Historical Study about Shikukaisei Urban Improvement at Keijo 1912-1937”, paper for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the Urban and Architectural Histories under Colonial Rule in Asia, the Institute of Taiwan History Preparatory Office (ITHPO) and the Program for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PROSEA), Academia Sinica, Sept. 6-7, 2000. (in Japanese)

